

額濟納 漢簡



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發掘述要

額濟納漢簡概述

初讀額濟納漢簡

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

額濟納旗出土漢簡圖版及釋文

額濟納漢簡綜合索引



魏堅 主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本书出版

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額濟納漢簡

○ 魏堅 主編

EJINA HANJIAN

○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

○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 中國文物研究所

聯合整理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桂林 ·

责任编辑 唐长兴
装帧设计 张 明
唐长兴
电脑制作 杨鹏广
陆润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额济纳汉简 / 魏坚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5633-5247-3

I. 额… II. 魏… III. 简 (考古) — 研究 — 额济
纳旗 — 汉代 IV. K877.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854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8
印张: 40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数字资源
PDG

《額濟納漢簡》編委會

魏 堅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白音查干 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系 教授

謝桂華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研究員

李均明 中國文物研究所 研究員

K 877.54
16

內容提要

額濟納漢簡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於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間在額濟納旗漢代烽燧遺址進行考古調查清理時出土的，共採獲五百餘枚，簡牘之釋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謝桂華先生、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內蒙古師範大學白音查干先生、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堅先生合作完成。這是繼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間發現第一批居延漢簡及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二年間發現第二批居延漢簡之後的第三次重大發現。其形制有簡、兩行、牘、札、楮、封檢等，存二件較完整冊書，其一尚繫有編繩，保存了冊書的原貌，尤為可貴。其時代以西漢中期至東漢早期者居多，最早紀年見漢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晚者見東

漢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若從字體考察或有極少東漢中期物。內容大體與以往出土的居延漢簡類同，以行政文書居多，涉及漢代政治、經濟、軍事諸領域，亦不乏新史料，如王莽登基詔書、分封單于詔書、行政條例等皆屬首見；涉及歷史地理的從涇陽到高平等地的驛置里程簿可與前此所出居延漢簡驛置里程相比對；有關名籍、債券契約等亦多異於舊簡，具研究價值，此外尚見《晏子》、《田章》及《蒼頡》、醫方、日書等殘簡。

本書收錄相關考古調查發掘遺跡、實物及簡牘圖版、簡牘釋文、簡牘內容考述、索引等。

Abstract

More than 500 inscribed bamboo slips of Han times were discovered and unearthed by the staff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99 to 2002 at Ejina Banner,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when they investigated the Han beacon tower sites. Therefore these slips were called *Ejina Bamboo Slips* following the discovery site. The paraphrase of these slips were undertaken cooperatively by experts as follows: Mr Xie Guihua from the Center for Bamboo and Silk Documents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Mr Li Junming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China, Mr Baiyinchagan from th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and Mr Wei Jian from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se bamboo slips were the third significant discovery since Juyan bamboo slips had been unearth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1930 through 1931, for the second time from 1972 through 1982. Ejina bamboo slips cover bamboo strips(*jian*), two columns(*liang-hang*), wooden tablets(*du*), polyhedral wooden prisms(*gu*), sealing strips(*jian*), title tags(*jie*), etc.,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shapes and functions. It is remarkable that two bound documents were kept integrally, especially one of them was still tied together by several sets of intertwined strings, thus preserving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bound document very well. Most Ejina bamboo slips can be dated to the period from the middle Former Han dynasty to the early Latter Han dynasty. The earliest date is the third year of *Shenjue*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Xuan(59 B. C.), and the latest date is the fourth year of *Jianwu*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wu(28 A. D.). It is possible that very few of the remaining slips can be dated to the middle Latter Han dynasty based on the form of calligraphy. The contents of Ejina bamboo slips are similar with those of previous *Juyan* slips, that is, mainly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which relate to the affairs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f Han times. In addition, these slips also provide some fresh data, such as the imperial edicts regarding ascending the throne, granting titles to the *Chanyu* of *Xiongnu*, and administrative statutes issued by Emperor Wang Mang which were first unearthed; the books of post stations and mileage from *Jingyang* to Gaoping and other places, which relate to historical geography, can be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of Juyan slips; the name books, bonds, and contracts and so on are greatly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lips, thus having great value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addition, the slips contain some remnants of *Yan Zi*, *Tian Zhang*, *Cang Jie*, Chinese medical prescriptions, and mantic texts and so on.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osed of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excavation and investigation involved, photographs of relics and bamboo slips, the paraphrase into traditional characters, textual research on slips and index.

凡例

一、本書以繁體字豎排釋文，異體字、別體字及原簡字跡清晰而未能釋出現行字者皆依原字形隸定釋文。

二、原簡上的各種符號，如重文號＝及●、■、／、マ等皆稍加規範依原形錄出。簡首網格紋皆作⊞。

三、括號內文字皆為編者所加說明文字。

四、編者在釋文中所加符號及其含義：

□，表示原簡字跡模糊未能釋定者，每字一「□」。

……，表示字跡模糊或字數亦未能確定者。

▣，表示原簡斷折處。

▢，表示封泥印匣。

五、簡號數碼及字母的含義依次為：

字母前的數碼，如「99」表示1999年出土、「2000」表示2000年出土、「2002」表示2002年出土。

E，表示額濟納旗。

S，表示烽燧。此「S」表示第七隧、「9S」表示第九隧、「14S」表示第十四隧、「16S」表示第十六隧、「17S」表示第十七隧、「18S」表示第十八隧、「CS」表示額濟納旗察干川古烽燧。

T，表示烽燧內臺階。

F，表示房舍遺址。

H，表示灰堆。

D，表示過道。T、F、H、D后之數碼表示具體遺跡單位之序號。

「:」后之數碼表示出土器物的序號。

出土器物序號后之A、B、C等依次表示多面簡牘之第一、二、三面。

序

◎李學勤

世紀之交的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河流域進行了三次調查發掘，新獲簡牘五百餘枚。這批珍貴文物，現已整理釋讀，以《額濟納漢簡》為書題，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對於簡帛學界，以及考古學、歷史學等方面的學者來說，這無疑又是一個大好消息。

在額濟納河流域出簡的地區，在漢代屬於張掖郡居延縣，故以居延遺址聞名於世。在簡帛學歷史上，這里已經兩度以重大發現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

大家都知道，我國西部簡牘的發現始於上世紀之初，從新疆的尼雅到甘肅的敦煌，諸批數量均不很多。最多的如《流沙墜簡》著錄的敦煌簡，也只有五百多枚。同時這些簡牘大都斷殘散碎，不足以體現當時的原貌，使研究受到很大限制。直到一九三〇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額濟納河地區掘得簡牘一萬一千多枚，居延漢簡由此名馳天下。隨後的整理研究，不僅極大地推動了簡帛學的前進，對歷史、考古等學科也起了巨大的影響。到了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考古工作者在額濟納河三個地點作了發掘，再次出土漢簡一萬九千餘枚，即轟動一時的居延新簡，使有關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詳細情

況和論著目錄，讀者可參看駢宇騫、段書安先生的《本世紀以來出土簡帛概述》（臺北萬卷樓，一九九九年）。

《額濟納漢簡》所收，是第三批的居延簡。書中有發掘報告、彩色的簡牘圖版及其釋文，還有額濟納漢簡的概述、索引。幾位專家學者，還就簡牘涉及的種種學術問題，撰文逐次討論。這部書的作者，包括了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學家，其聯手合作保證了書的水準質量。

通過這三批居延簡的發現及其研究，我們可以有以下幾點體會。

首先是簡牘的研究必須立足於考古工作的基礎之上。簡牘是載有文字的遺物，它們和所有其他考古遺物一樣，是遺存的組成部分，因而應該放在整個遺址的背景之中來考察。例如在居延這里，出簡地點的性質、年代等因素，都是與所出簡牘不能分隔的。離開遺址，孤立地考釋簡牘，每每會釀成種種誤會。同時簡牘的內容，又是認識有關遺跡的重要依據，只有互相結合起來，才能使研究切實深入。居延遺址早年的工作，限於那時的條件而不能做到的一些地方，在近期發掘整理中得到了注意和加強。

其次是簡牘的保護應該及時進行。西部的土地和氣候條件，固然與內地一些卑溼地點不同，有利於簡牘的完好保存，但簡牘在出土之後還是不免會發生一些變化。特別是第一批居延簡，在戰爭時期屢經播遷，字跡淡褪等現象尤為嚴重（參看一九九八年印行的《居延漢簡補編》）。因此，簡牘一經出土，有必要盡快採取保護措施，隨即實施攝影，需要時還應做紅外線攝影，以取得最佳情況的資料。

還有一點，是簡牘的資料要盡可能迅速地提供給學術界。第一批居延簡在一九三一年夏運抵北京整理，后因抗日戰爭爆發，這一工作被迫中斷。一九四三年，勞干先生《居延漢簡考釋》釋文出版，次年印出同書考證，很長時間以來為學者所引用，至於圖版，到一九五七年以後才與讀者見面。第二批居延簡的整理出版，其時間過程也是較長。這固然有各種原因，但對於學術進展總是不那麼有利的。《額濟納漢簡》得以在短短兩年后就問世，雖然簡數不多，但發掘單位非常重視，及時組織專家集中力量進行整理，出版社也給予積極配合，大力投入。對於他們的工作，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今天的簡帛學不但早已成為獨立的學科，而且發展出了一些分支，如西部簡牘的研究，簡帛書籍的研究，都有專門學者從事。在西部簡牘研究範圍中，居延簡具有最重要的地位，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不久前

逝世的日本學者大庭脩先生，在他於病榻上寫出的最后著作《留在木片上的文字——中國木簡的世界》中，便以突出的篇幅論述了居延簡。居延還會有更多更重要的簡牘發現，《額濟納漢簡》一書給了我們新的希望。

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於清華

居延考古的新里程（代序）

——在居延考古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講話

◎林 澧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朋友們：

會議要我來作一個總結性的發言，實在沒有時間準備，而且我也不一定總結得好。不過我今天來總結是爲了表示對會議組織者和辦會同志的深切感謝，講得不好，請原諒。

先談點感想。這個研討會報告和討論的時間都不長，其中有兩天的參觀，剛才魏堅已經說了，這兩天的參觀機會確實很難得。居延這個地方是很少下雨的，可是我們第一天就碰到下雨了，冒雨訪問居延城大概是考古史上的佳話，可以說是空前的，當中還有很多驚險浪漫的場景。這次會議雖然很短，但我想在各位與會者的心里可能是一次最難忘的會議。現在我就講講這次會議研討的內容。

這次會議的第一個主題是居延考古。我們回顧一下，從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二年，有一個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館、額濟納旗文物所三家聯合組成的，還有一些相關單位配合的聯合考古隊，連續幾年堅持做了一些工作。這次會議就是對幾年

工作當中主要成果的展示，而且也可以說是對聯合考古隊工作的一個總結。當然這些年工作當中最主要、最突出的部分，是對出土漢簡的遺址所做的發掘工作，還有就是對發掘出土漢簡的研究總結。這項工作應該是最有收獲的，總共有五百多支漢簡。我聽說這些發掘成果的報告明年就可以出版。在整個漢簡的發現研究歷史上，我認爲這個報告的出版在三個方面有開創性：

第一方面，這些漢簡是嚴格按照現代考古的方法發掘出來的，漢簡的報告和遺址的報告是完全密切、有機地組合在一起的。早在一九三〇年的漢簡發掘，就單單挖的是漢簡。其后甘肅省也報告了一些從烽燧遺址里發掘的東西，但是報道非常簡單，只是作一個陪襯。這次應該是一個正式的科學報告，發掘了好幾個烽燧，我們大家都去看了，發掘出來的遺跡現象非常豐富。發掘出來的遺存跟漢簡的內容可以互相聯系起來進行研究，也就是說，發掘出來的東西可以幫助解釋和理解漢簡上文字記載的內容；文字記載的內容又可以指導我們在進一步的發掘中，理解和解釋考古當中遇到的種種現象。

所以，應該說這次漢簡發掘和研究是前所未有的，是有突破性的。

第二方面，發掘報告的稿子已經寫好，只用了不到兩年的時間，明年就可以出版。過去第一次漢簡發掘出來是經過很多年以後才發表的，而且發表的先只有釋文，沒有圖版。後來解放後發掘的那次，發表也不是很快，而且有一部分到現在還沒有發表。現在這批漢簡這麼快就能夠發表，應該說是為以後的簡牘發掘和研究做了一個榜樣。由於在學術界大家都急切看到新東西，發掘出來却不發表是非常不好的現象。所以說這次的工作是一個非常好的榜樣，在漢簡發現和研究上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第三方面，這次發表的材料是帶上釋文的，而且還有專門的研究論文附在報告里，這也是開創性的。因為過去發表材料和考釋往往是分開的，比如說馬王堆的材料，就是材料單獨發表，另外再去考釋。這次在發表的同時就請有威望的專家——比如來開會的謝桂華先生和李均明先生都是漢簡研究方面的權威——作出考釋，把考釋跟材料一起發表。我覺得以後還有簡牘發現的話，應該走這樣的路，這是非常正確的。過去考釋的人和發表材料的人往往是分家的。有的發掘的人不願意讓專家來考釋，但是自己考釋的水平往往又有問題；或是自己來編文字編，而文字編又編不好。這種現象是

很多的，它的后果是耽誤研究和耽誤其他學界來利用材料，是不好的現象。所以，這次這樣做也是樹立了一個好的典範。

當然，這次發現的漢簡數量不是很多，我到現在只看過魏堅拿來的一盒簡。但是謝先生將這批簡的內容總結為七個字：少而精，推陳出新。而且把研究的心得在會上已經介紹了。據謝先生說，這些漢簡在多方面都是有意義的，除了漢簡本身以外，在簡牘學上，在文獻學上，在考古和史學研究上都會有很重要的意義。白音查干教授在這方面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說這些漢簡在對漢代歷史的研究上，也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漢簡的發現和漢簡的研究以後一定會更上一層樓。當然，這次發掘報告不叫『居延漢簡』，而叫作『額濟納漢簡』。對於這個叫法好不好，我附帶發表一點意見。這方面我是外行，據李先生說，以前發表的居延漢簡里面有一些其實不是居延都尉的東西，比如肩水都尉就是不屬於居延都尉府的。因此，叫『額濟納漢簡』包涵性應該比叫居延漢簡要準確一些。拿現代地名命名漢代的遺存，這本身就沒有什麼問題，就像甲骨文，叫『小屯南地甲骨』，商代時候肯定沒有小屯。問題是某一批漢簡是不是應該有一個統一的叫法，我想這是沒有必要的，要區別具體的漢簡，可以用哪一年發現和在哪個地點出土來命名。叫『額濟納漢簡』也有一定的新意，

但將來會不會被承認，也就是會不會流行，學術界是否願意用，那是現在還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這個叫法肯定是有它的優點的。

聯合考古隊的工作，還有一項我認為是非常好的，就是滕銘予教授在這次會上報告的對漢代候官以上的城障，以及從青銅時代到元代的城址作了科學的、精確的測量，使我們對居延地區重要的考古遺址有了大概的了解。這次大家來實地參觀，我相信會有不少新的感受。滕銘予教授介紹居延城的時候，就說雖然叫「居延城」，這是許多人認為它是居延都尉府的所在地，但是她覺得有問題。後來我私下問魏堅，怎麼有問題呢？魏堅就跟我說了他的看法。那天冒雨訪問居延城歷險回來後，謝先生興奮地跟大家說，以前這個居延城我沒有來過，來了就認為不是居延都尉府所在地。這就是經過實地考察而得出的看法，那幾點原因我就不在這裡介紹了。也就是說，通過實地考察大家都會得出一些新的看法，這些新的看法往往是英雄所見略同，使我們逐漸把歷史上的問題越搞越清楚了。

這次會議的另外一個主題是邊疆考古。這方面有很多論文，只是因為時間的關係，論文沒有全部都拿來講。還有一個遺憾，有些人發表的論文，由於條件所限，不是每個人手里都有。就邊疆考古方面來說，我想發表兩點意見：

第一，這次會議的論文雖然數量不多，但是體現了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在邊疆考古中，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方式。今天上午就有兩篇是環境考古方面的論文，還有由於時間關係沒有發表的關於體質人類學方面的文章，還有DNA的問題。邊疆考古就應該這麼搞，這是一個趨勢。實際上，要弄清問題，確實需要採取多學科合作研究的方式。像今天楊建華教授講的游牧還是畜牧的問題，白音教授就問畜牧群中的羊是怎麼構成的？我們考古上本來做的鑒定就是山羊和綿羊不分的。但這並不是應該如此。王立新在這次會議的報告中，提到林西井溝子墓葬隨葬的山羊、綿羊各占一半。雖然這只是個很小的問題，但是說明考古學材料的分析和報道就需要有別的學科融入進來。所以我覺得這次研討會中的論文開始有了一個比較好的趨向，特別希望今後這方面的研究能進一步深入。

第二，這次會議的文章當中，有相當數量的文章是用世界考古的視野和視角來看中國的邊疆考古。比如這次周南教授的論文，把中國與中美、南美安第斯山脉三個地區從考古材料反映出來的社會結構的發展形成進行比較，有什麼共同點，有什麼相異點。如果單單從中國的材料來看，很多問題是看不出來的，也不明白中國這個材料的意義和特點。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楊建華教授的論文，他從歐亞草原發展的四個階段這個宏觀

角度，來看中國北方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從這個觀點來看游牧文化的發生和發展，這給我很大的啓發。中國北方草原就是歐亞草原的一部分，整個歐亞草原的情況你不知道，把我們這一塊地方說得再怎麼樣，那也是不行的，每一個地方的材料都是不全面的。歷史上真正發生過的事，你考古能考出來的畢竟只是一部分而已，肯定要把各個地區打通來看。這樣我們才能對共同性的、規律性的問題真正有所認識。當然還有其他人的文章，如吉迪的文章，把夏家店上層文化與東歐、中亞的文化進行比較，和這些東西一起來看，文化方面反映經濟上的情況，經濟應該與文化上反映的情況有聯系。這次還有一篇比較有特點的文章，就是齊東方教授的文章，是研究閩南文化的。閩南也是邊疆，按照過去的方法，就是看閩南文化與中原地區有什麼關係，閩南地區與廣州有什麼關係，這個眼界就不大，因為福建是在海上。他文章里就講閩南與東南亞有什麼關係，與海外其他地區有什麼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閩南文化到底是怎麼發展起來的。因為邊疆地區的文化都不是單從自己的文化就能產生出來的，既然是邊疆，就應當是在很多文化因素的刺激下才發展起來的。如果不把眼睛看遠一點，我們就不能認清邊疆地區的文化。所以我們想問題思路應該開闊，開闊了才能把邊疆問題搞明白，所以我們要跟國外接觸，我們開會的時候國外的學者來

了，我們就可以知道人家怎麼看。當然，還有很多讓我們看問題時用寬廣的眼光來看的途徑，這個應該是我們搞邊疆問題的學者的基本功。現在我們的基本功還不好，我們要借這個會議更多地練這種基本功。要有強烈的充實自己的意識，才能把邊疆考古這個學術任務更好地完成，而且一代要比一代完成得更好。

二〇〇三年十月十三日於額濟納

目錄

凡例		(〇〇一)
序		李學勤(〇〇三)
居延考古的新里程(代序)		林 澧(〇〇五)
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發掘述要		魏 堅(〇〇一)
額濟納漢簡概述		白音查干 特日格樂(〇二二)
初讀額濟納漢簡		謝桂華(〇三二)
額濟納漢簡法制史料考		李均明(〇五四)
額濟納旗出土漢簡圖版及釋文		(〇七一)
額濟納漢簡綜合索引		(二九九)
后記		(三〇五)

額濟納旗漢代居延遺址調查與發掘述要

◎魏堅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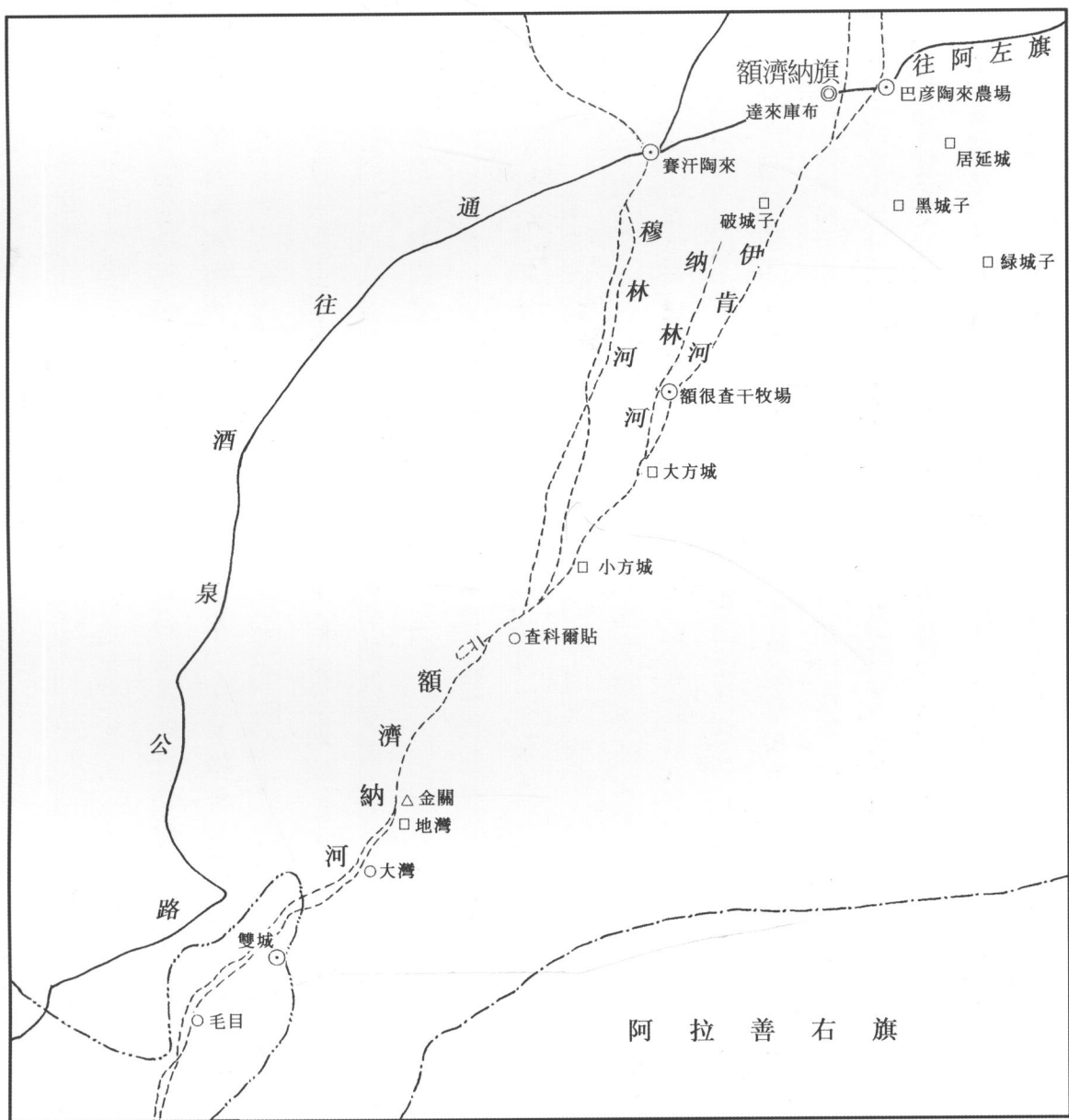
居延遺址位於額濟納河流域，其地南起甘肅省金塔縣毛目，北至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索果淖爾南端的宗間阿瑪，全長二百五十餘公里。其中在額濟納旗境內分布約二百三十公里，主要城址和重要遺存均位於額濟納河下游（圖版壹，一），所有圖版放在『額濟納旗出土漢簡圖版及釋文』之後，下同（西至納林河、東到居延澤（圖版壹，二）的寬約六十公里的範圍之內。在這一區域內，目前發現有青銅時代遺址一處，不同時期的城址十三座，墓葬區六處，漢代烽燧一百餘座，西夏至元代的廟宇、佛塔十餘處，以及大片的屯田區和縱橫曲折的河渠遺存等（圖一，圖隨文排，下同），是內蒙古西部重要的大型遺址之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居延地區先秦時稱為『弱水流沙』，秦漢以後始稱『居延』。據學者考證，『居延』為匈奴語，是『天池』或『幽隱』之意。《書·禹貢》記大禹治水，為疏通九浚大川，曾『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弱水即為今日之額濟納河，合黎應為河西走廊以北的合黎山，流沙則為居延澤。當兩漢之時，漢朝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的匈奴，所以特別重視西北方的邊塞防務，漢武帝元狩二年（前一二七年），衛青收復『河南地』（今烏加河以南鄂爾多斯河套地區），從烏蘭察布盟的集寧東南，大體沿北緯四十一度綫，循陰山南麓而西，直達烏蘭布和沙漠邊緣，在秦蒙恬長城的基礎上，又對長城進行了修繕和加固。此後於太初三年（前一〇二年）又在陰山以北築長城，『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廬胸』（新疆阿爾泰山南麓），稱為『外城』（《漢書·武帝紀》）。近幾年的調查發現，這是兩條未曾完工的石築長城，彼此相距五至五十公里（在今包頭達茂旗向西，經烏拉特中旗至後旗，進入蒙古國境內，又西達額濟納旗索果淖爾東北），大致在北緯四十二度綫左近。與此同時，為遮斷匈奴入河西之路，『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御匈奴』（《漢書·地理志》，史稱『遮虜障』。當時的居延都尉府（圖版貳，二）就坐落在居延澤西岸的綠洲上。因此，居延一綫是防禦匈奴的戰畧要地。這裏的塞防工事向東與五原外城連接，向西南沿弱水（額濟納河—黑河）和疏勒河抵敦煌境內的玉門關，是漢代最重要的防綫。

在漢代文獻中，『長城』是上述塞防的總稱，具體的一段稱為某塞。居延都尉為漢張掖郡肩水、居延兩都尉之一。據此前的調查發掘和對漢簡的研究，居延塞分屬甲渠、卅井、殄北三個候官管轄，其下各領有幾十個烽燧不等。在甲渠

候官下轄的烽燧中，還分別由若干個烽燧組成幾個「部」，是介於「候官」與「燧」之間的建制。部設候長，烽燧設燧長，各司候望之職。

漢代居延地區農業發達，是漢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作為河西走廊的屏障，在漢對匈奴的戰畧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代在此設「寧寇軍」統領居延軍務，為防突厥侵擾，曾在居延築大同城等，現今古城及烽火臺猶存。西夏至元代，是居延地區繼兩漢後的又一個發展時期。西夏王朝在居延設置了「黑山威福軍司」和「威福軍城」（即黑水城）。元代置亦集乃路總管府，其治所就是在西夏黑水城基礎上擴建的黑城遺址，蒙古語稱作「哈拉浩特」。這一時期的農業相當發達，存留有較多的農田及河渠遺址。宗教也在這一時期有了較大的發展，各類佛教寺廟、古塔



圖一 居延遺址主要遺跡分布示意圖

以及伊斯蘭教的清真寺等隨處可見。清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駐牧於伏爾加河卡爾梅克草原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首領阿玉奇，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統治，派其侄子阿拉布珠爾，陪同其母親和妹妹率五千人，赴西藏朝拜，此舉得到了清政府的准允，并在京師謁見了康熙皇帝，就此拉開了土爾扈特人回歸祖國的序幕。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年），詔封阿拉布珠爾為固山貝子，賜牧色爾騰，後於雍正九年（一七三一年）得額濟納河流域為駐牧地。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使居延遺址如古絲綢之路上的羅布泊和樓蘭古國一樣聞名遐邇。由此，在二十世紀初，居延遺址即由於俄羅斯人科茲洛夫、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來華盜掘和瑞典人斯文·赫定、貝格曼等人的調查，而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科茲洛夫在一九〇三年率領俄國遠征隊首次進入黑城，進行了一周的盜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穫，運走了大量的文物，現在藏於彼得堡；隨後又於一九〇九年五月，再次對黑城進行了八周的盜掘，所掠文書、雕塑和青銅器等，整理成四十多個包裹，掠往彼得堡。斯坦因在一九一四年五月盜掘黑城，其發現雖畧遜於科氏，但也將相當數量的文書和文物掠走，文書現藏於大英博物館，其他文物藏於印度新德里博物館。

斯文·赫定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間，曾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到達居延。一九三〇年，貝格曼在額濟納旗著名的居延邊塞，發現了眾多的亭隧障塞，並進行了發掘，主要獲得總數達到上萬枚的漢簡，現藏於臺灣。出土大批漢簡的同時，貝格曼在居延還發現了可能是文明史上最古老的紙，以及第一支完整的毛筆。

新中國成立後，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於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也先後調查和發掘了黑城遺址，獲取了部分文書、紙幣等文物，對黑城的研究也取得了進展。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額濟納旗劃歸甘肅建制時，曾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對居延地區的漢代亭隧障塞進行了調查，並發掘了『甲渠候官』、『肩水金關』和甲渠塞『第四隧』。著名的甲渠候官治所破城子遺址，就以出土近兩萬枚漢簡而享譽中外。此外，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也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調查了居延遺址，獲得了二百余枚漢簡。

居延漢簡，是《史記》、《漢書》之外，存世數量最大的漢代歷史文獻，其年代幾乎橫貫了兩漢的數百年。居延漢簡的發現，在當時甚至今天都是震驚學術界的重大事件。當時有人曾將這一成就與打開敦煌藏經洞並列為中國二十世紀西北兩大發現。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漢簡研究成為一門新興的顯學，成果豐碩，影響頗大，成為考古發現對歷史研究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成功範例。